

博雅文学论丛

文学史的『诗与真』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

解志熙 著

國自清華月自明
西山爽氣北軒風
仰見言子如吾輩
卻嫌生處秋光此
話語橋天雷過耳
斯文掃地雨打蓬
書生漸覺世多事
下坂慢走數歸程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博雅文学论丛

文学史的『诗与真』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

解志熙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解志熙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1
(博雅文学论丛)
ISBN 978-7-301-23299-6

I. ①文… II. ①解…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研究
IV. ①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3544 号

书 名: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

著作责任者:解志熙 著

责任编辑:张文礼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3299-6/I·2684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pkuszs@126.com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15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8.75 印张 485 千字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爱欲抒写的“诗与真”

——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	1
一部田园牧歌背后的爱欲隐衷：且从《边城》表里的	
“不凑巧”说起	1
从“爱欲的压抑”到“情绪的体操”：沈从文的	
爱欲观与文学观之回溯	9
从苦闷的“自叙传”到抒情的“爱欲传奇”：沈从文	
二三十年代创作的“变”与“转”	24
理想的人性乐园和愉快的抒情美学：沈从文 30 年代	
乡土抒写的得与失	42
“抽象的抒情”之底色和“最后的浪漫”之背后：	
沈从文 40 年代“新爱欲传奇”的“诗与真”	61
“余响”费猜详：关于沈从文 40 年代末的“疯与死”	97
“诗与真”的纠结之归结：新的与旧的浪漫性之统一	106

沈从文佚文废邮再拾	110
废邮存底·致丁玲	110
废邮存底·辛·第廿九号	114
旱的来临	116
读书随笔	117
梦和呓	119
文 字	121
敌与我	122

新废邮存底·关于《长河》问题，答复一个生长于

吕家坪的军官（残） 125

新废邮存底·致莫千（残） 126

给一个出国的朋友 127

诗人节题词 130

新书业和作家 130

纪念诗人节 135

遗文疑问待平章

——新发现的沈从文佚文废邮考略 137

友谊与爱情的遗迹：沈从文致丁玲的信和给张兆和的情书 ... 137

爱国与爱欲的焦虑：沈从文抗战及40年代的佚文废邮 143

沈从文佚文辑补 151

人的重造——从重庆和昆明看到将来 151

《〈断虹〉引言》附函 154

一个理想的美术馆 154

“最后一个浪漫派”的人文理想之重申

——沈从文佚文辑校札记 159

从《立言画刊》上的《废邮存底补》说起 159

《世界晨报》上的沈从文文章书简 162

人的重造：“最后一个浪漫派”的人文理想之重申 164

相濡以沫在战时

——现代文学互动行为及其意义例释 170

相濡以沫在战时：沈从文给李健吾的慰问信及其他 170

海上羁客有所思：李健吾对林徽因、沈从文的感怀 176

临风寄意怀远人：柯灵组编《作家笔会》的苦心 181

文人交往有深致：文学互动行为的文学史意义 185

关于《春蚕》评价的通信

——从吴组细和余连祥的分歧说起 192

一 192

二 196

三	204
附 记	212

补遗与复原

——冰心 40 年代佚文辑校录	215
默庐试笔（前六节）	215
由评阅蒋夫人文学奖金应征文卷谈到写作的练习	220
冰心词稿——洞仙歌·题石屏李右侯尊堂《机灯 课子图》	224
请 客	225
从歌乐山到箱根	227
冰心女士对于日本妇女的印象	229
附录一 做梦	231
附录二 冰心女士讲旅日感想	234

人与文的成熟

——冰心 40 年代佚文校读札记	237
《默庐试笔》补遗：“沉默已久”后的冰心新作	237
复原与辨正：《请客》、《做梦》及《从歌乐山到箱根》	240
合与分：有关“蒋夫人文学奖金应征文卷”评阅的 三篇文字	244
两篇访谈：冰心的日本观感和对战后中日关系的思考	247
人与文的成熟：关于 40 年代的冰心	252
附 录	258

惟其是脆嫩 何必是讥嘲

——也谈所谓“冰心—林徽因之争”	261
来自“我们太太的客厅”的观察：沈从文和李健吾 观点的片面性	261
美丽的新风雅：京派的人文理想和冰心的冷眼旁观	265
毕竟不一般：林徽因和冰心心照不宣的相互回应	271

“献上我们的智与力”

——老舍抗战及 40 年代诗文拾遗	275
战壕里的呼声	275

老舍的话——答《青年向导》“青年问题专号”征文函	277
两年来抗战中的文艺运动	278
军 歌	284
劳军感言	286
怎样开始写作?	287
一年间的文学	289
献上我们的“智”与“力”	290
乙酉重阳于、程两诗翁招饮赋此述志并以致谢	292
美国来鸿——致吴云峰	292
“风雨八年晦，贞邪一念明”	
——老舍抗战及40年代佚文校读札记	294
一篇小说、一次讲演及一场座谈：老舍对初期	
“抗战文艺”的反思及其与延安文艺界的呼应	294
“诗歌”传统的复兴与军民关系的新变：	
老舍抗战时期几篇劳军—拥军诗文所传达的信息	302
诗函答问见心声：热情爽朗的老舍及其在抗战后的忧愤	308
卞之琳佚文佚简辑校录	316
流 想	316
年 画	319
五个东北工人	321
日华亲善	323
游击队请客	325
渔 猎	327
又坐了一次火车	328
寄自峨眉山	332
儿 戏	333
女人，女人	337
致叶以群	344
读诗与写诗	345
××礼赞	349
意见，意见，还是意见——读奥登《新年信》附注偶记	353
伏枕草：洒脱杂论	357

夜起草：前进两说	361
复《文学创作》编者函	366
新文学与西洋文学	368
中国“新诗”的发展与来自西方的影响	371
附录 关于战地文艺工作	379
 灵气雄心开新面	
——卞之琳的诗论、小说与散文漫论	385
卞之琳诗学的象征观、音节观和传统观及其他	385
“小大由之”的战时叙事：从《游击奇观》 到《山山水水》	394
析理绵密的知性散文：卞之琳的“论说文”略说	398
 胡风的问题及左翼的分歧之反思	
——从“胡风与鲁迅的精神传统”说开去	403
周恩来和胡风在发挥“鲁迅精神”上的异同：关于“重庆 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	403
“仇恨”心态和“战斗”愿望缘何而生：一个“青年鲁迅派” 暨“启蒙左翼”的“主观战斗精神胜利法”	415
最后的“斗争”为何遭遇“团结”的处理： “胡风集团”冤狱的成因与左翼文学运动的终结	436
 后 记	450

爱欲抒写的“诗与真”

——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

一部田园牧歌背后的爱欲隐衷： 且从《边城》表里的“不凑巧”说起

1934年的一天，被公认为最懂感情的现代才女林徽因在家中接待了沈从文。此时的沈从文还在新婚的余韵中，而他的文学事业也佳作频出、蒸蒸日上，赢得了一片喝彩，所以朋友们都觉得苦熬多年的从文如今可谓感情与创作的双丰收，真是生活在美满幸福之中，谁也没有想到他正深深地陷在一场情感危机里备受煎熬。深感难以自拔的沈从文不得不去向擅长处理感情纠葛的林徽因求教和求救。听着沈从文激动地倾诉其感情的困扰，林徽因十分惊讶而又非常惊喜，因为她由此发现了一个与自己有着相同苦恼的现代人沈从文。事后，林徽因特地写信给其美国友人费正清、费慰梅夫妇，向他们报告了自己的这一“发现”——

不管你接不接受，这就是事实。而恰恰又是他，这个安静、善解人意、“多情”而又“坚毅”的人，一位小说家，又是如此一位天才。他使自己陷入这样一种感情纠葛，像任何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一样，对这种事陷于绝望。他的诗人气质造了他自己的反，使他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茫然不知所措，这使我想到雪莱，也回想起志摩与他世俗苦痛的拼搏。可我又禁不住觉得好玩。他那天早上竟是那么的迷人和讨人喜欢！而我坐在那里，又老又疲

惫地跟他谈、骂他、劝他，和他讨论生活及其曲折，人类的天性、其动人之处及其中的悲剧、理想和现实！……

过去我从没想到过，像他那样一个人，生活和成长的道路如此地不同，竟然会有我如此熟悉的感情，也被在别的景况下我所熟知的同样的问题所困扰。这对我是一个崭新的经历。而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普罗文学毫无道理的缘故。好的文学作品就是好的文学作品，而不管其人的意识形态如何。今后我将对自己的写作重具信心，就像老金一直期望于我和试图让我认识到其价值的那样。万岁！^①

撇开林徽因对左翼文学的傲慢与偏见不谈，她对沈从文的“发现”倒是至今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提醒，因为迄今仍有许多人只把沈从文看成一个过于单纯的“乡下人”、一个只会写优美田园牧歌的乡土抒情作家、一个数十年如一日地沉浸在童话般美满婚恋中的幸运儿，殊不知他在爱欲上的憧憬、苦闷和挣扎并不亚于最西化的现代知识分子，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他在这方面的苦闷和挣扎之影响于他的生活和创作，也实在是既深且重、非同寻常。或许只有弄清了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之由来及其对沈从文的重要意义，我们才能理解沈从文半生的“常与变”以至解放前夕的“疯与死”之症结。

即以沈从文的杰作《边城》而论，它就远非乍一看那么单纯，而委实是别有寄托在焉。

按，自《边城》问世之后，它就成为关于沈从文文学的评论与研究之焦点，而以《边城》为代表的1930年代创作，已然成为标志着沈从文一生创作最高成就的辉煌阶段，此前此后往往被忽略不计了。检点评论界和学术界近八十年来对这一时期沈从文创作的观感，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认知趋同现象，那就是无论人们的评价是高是低，但下述三点印象却成了没有争议的共识：其一，文学上的沈从文是一个“人性”的执著坚守者和倾心表现者；其二，他所坚守和表现的人性是以其特有的“乡下人”的经验和爱憎为标准的；其三，他对其所

^① 林徽因：《致费正清、费慰梅·一（1934年）》，《林徽因文集·文学卷》第354—35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

醉心的乡村人性美、风俗美兼及自然美之表现，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抒情化叙述方式。这三点自然是统一的，此所以沈从文写了那么多关于田园乡土的抒情小说以及抒情散文，悉心表现“乡下人”的人性美、风俗美连带着自然美，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对都市里的卑琐人性和卑琐文化的批判。大凡读过《边城》以及稍后的《长河》等作品，再看看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习作选集〉代序》和《〈长河〉题记》里的自我解说，大概都不难得出上述观感。当然，左翼批评家和左翼文学史家对这样一个沈从文是不满的，但那并不妨碍他们认定沈从文及其创作就是“如此这般”这样一个事实。而非左翼的批评家和研究者则对这样一个沈从文及其创作大都赞赏有加。事实上，近三十年来的文学史论著对沈从文文学的总体论述，基本上都是以沈从文这一时期的这样一些作品，尤其是《边城》和他的这样一些自我陈述为依据，从中概括出来的看法大抵不外上述三点，其一致性几乎达到了众口一词的程度。由此，一个虽然保守却淳朴可爱的“乡下人”沈从文孜孜矻矻用文学建筑人性小庙的美好形象，成了近三十年来文学史叙述中的沈从文的“文学标准像”。再加上不断推出的沈从文文学传记或评传的宣叙，一个有点保守而又非常可爱的“乡下人”进城后用文学守望人性、收获事业与爱情双重成功的故事，已成了学界以至世人津津乐道的美好传奇。近来又据说，正是上述三点汇聚成了沈从文可爱的“保守性”，从而显示出迥然有别于启蒙的“五四”新文学和革命的左翼文学之反现代性、非政治性云云。总而言之，经过许许多多文学史论著的反复论述，这样一个“乡下人”沈从文的“文学标准像”，已成为深入人心的存在和无可置疑的定论了。

坦率地说，这样一个以《边城》为中心观照而得的沈从文“文学标准像”，也曾是我长期以来的印象。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读到沈从文的一些重要自述文字如《水云》、《从现实学习》等，我才多少意识到这个流行的沈从文“文学标准像”或许只是一个表象。进入新世纪以来，不时地拜读新出版的《沈从文全集》，并且不断地有缘接触到沈从文的一些佚文废邮，把它们与《沈从文全集》中的相关文本反复校读，使我越来越深切地感觉到，在“乡下人”沈从文的“文学标准像”背后，其实还存在着另一个更多苦恼的现代文人沈从文。

对此，沈从文自己其实早有暗示。说来有趣的是，“乡下人”沈

从文进城后专心致志于乡土抒情的“文学标准像”，原是沈从文自己有意无意地帮助读者建构起来的。多年来他反复地强调自己的“乡下人”身份、爱憎及其对自己文学活动的决定性等，从而把自己从纷纭扰攘的文坛中区别出来，成了一个不同一般因而更加引人注目的存在。可是当沈从文发现人们仅仅这样看他和他的作品时，他似乎又感到有些得不偿失，因而不无牢骚和不满。譬如，1936年1月1日，已成京派文坛重镇的沈从文编完自选集，他在代序中虽然一如既往地自矜其“乡下人”气质，却又怅然若失地抱怨说，读者倘只把他的作品视为一个“乡下人”讲乡土的清新故事，实无异于“买椟还珠”，那对作为作者的他则意味着创作的失败——

我这种乡下人的气质倘若得到你的承认，你就会明白我的作品目前与多数读者对面时如何失败的理由了，即或有一两个作品给你们留下点好印象，那仍然不能不说是失败。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①

这段表白特别值得玩味。因为“照例”，读者对《边城》等杰作的“好印象”，不正在于它们乃是一个富于“乡下人的气质”的作家对乡土田园风情之清新的抒叙么？然而细绎沈从文这段话的上下文，他对读者这样的欣赏其实并不那么欣然，反而慨叹《边城》乃是“成功的失败”——成功了的是其显然的乡土田园风情之抒叙，失败了的则是其“背后蕴藏的热情”、“背后隐伏的悲痛”，这才是他着意要向读者传达的东西，可是正因为乡土田园风情的抒叙太成功了，反倒使那“背后蕴藏的热情”、“背后隐伏的悲痛”不被读者所注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然而可惜的是，就连沈从文的这个郑重提醒也被人“顺理成章”地误解了——评论界和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沈从文所谓“背后蕴藏的热情”、“背后隐伏的悲痛”，乃是在叹惋那极富人性美、

^①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第9卷第4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本书所引《沈从文全集》均为此版本，下文不再注明版次。

风俗美兼自然美的乡土文明之被销蚀而消逝。笼统地说，沈从文未始没有这样的伤感和隐忧，但具体而言，那未必就是沈从文寄托在《边城》里的隐衷和真意。正是有憾于这种几乎成了定式和惯性的解读，沈从文在40年代撰写的长篇创作自述《水云》里，又一次慨叹《边城》的真意不被理解，并强调那真意乃是一些更隐秘的个人哀乐——

我的新书《边城》是出了版。这本小书在读者间得到些赞美，在朋友间还得到些极难得的鼓励。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在什么感情下写成这个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写它的意义。即以极细心朋友刘西渭先生的批评说来，就完全得不到我如何用这个故事填补过去生命中一点哀乐的原因。正惟如此，这个作品在个人抽象感觉上，我却得到一种近乎严厉而讽刺的责备。^①

如所周知，“刘西渭先生的批评”即李健吾的同名评论《〈边城〉》。正是在这篇评论里，李健吾盛赞《边城》“是这样一部 idyllic（田园牧歌风格的——引者按）杰作”，并把它与沈从文的另一篇显然更富现代性的性心理分析小说《八骏图》作了这样的区别比较——

环境和命运在嘲笑达士先生（《八骏图》的主要人物兼叙述者——引者按），而作者也在捉弄他这位知识阶级人物。“这自以为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他是一个小说家，）以为自己身心健康，“写过了一种病（传奇式的性的追求），就永远不至于再传染了！”就在他讥诮命运的时光，命运揭开他的癍疤，让他重新发见他的伤口——一个永久治愈不了的伤口，灵魂的伤口。这种藏在暗地嘲弄的心情，主宰《八骏图》整个的进行，却不是《边城》的主题。作者爱他《边城》的人物，至于达士先生，不过同情而已。^②

①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113页。

② 刘西渭（李健吾）：《〈边城〉——沈从文先生作》，《咀华集》第75—76页，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

李健吾对《八骏图》的解读——它揭示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达士先生（小说家达士身上显然有沈从文的投影）在“性的追求”上的心理隐曲——是非常到位的，可是他只把《边城》视为一部纯粹的田园牧歌，确乎完全忽视了它“背后蕴藏的热情”、它“背后隐伏的悲痛”。其实，像《八骏图》的显现一样，《边城》的背后同样有沈从文“被压抑的热情”之投射。只是那投射在《边城》中的个人隐衷过于隐蔽，李健吾无从知晓，所以他对《边城》的解读，便难免让沈从文有“完全得不到我如何用这个故事填补过去生命中一点哀乐的原因”之叹。

李健吾无疑算得上沈从文理想的“高级读者”，可是连他也全然不解沈从文寄寓在《边城》背后的隐衷，这足证沈从文倾注于《边城》中的寄托过于隐蔽了。有鉴于此，沈从文后来不得不在其创作自述《水云》里自曝其当年创作《边城》的隐衷：那时的他在多年的挫折、压抑和奋斗之后，终于获得了事业的成功，并且即将与他苦苦追求的一位美好女性张兆和结为佳偶，不料就在结婚的前夕，他却偶然地与一个“偶然”——另一个美丽的女性——遇合，两下里显然都“有会于心，‘偶然’轻轻的叹一口气。‘美有时也令人不愉快！譬如说，一个人刚好订婚，不凑巧又……’”，双方怀着相见恨晚之感怅然分手后，沈从文即与未婚妻张兆和结了婚。可是新婚的幸福生活并不能使沈从文心满意足，不无惆怅和苦闷的他为了平衡生命的波动、转移情感的压抑，便在新婚期间开始了《边城》的写作——

因此每天大清早，就在院落中一个红木八条腿小小方桌上，放下一叠白纸，一面让细碎阳光晒在纸上，一面也将为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故事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旁所见的一个乡村，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就用身边黑脸长眉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良善式样。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故事中浸透了五月的斜风细雨，以及那点六月中夏雨欲来时的闷人的热，和闷热中的静与寂寞。这一切其所以能转移到纸上，依然可说全是从两年间海上

阳光得来的能力。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方得到了完全排泄与弥补。^①

近年已有学者注意到沈从文在《边城》中所暗寓的个人隐衷，如刘洪涛君就指出“《边城》是他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又逃避的结果”，并考证出那个让沈从文深感诱惑的女子是高青子，一个爱好文学的美丽女士。^②此外，据美国学者金介甫的考证，《八骏图》里引诱达士先生的那个女子，其原型乃是青岛大学的校花俞珊。^③虽然沈从文与高青子、俞珊认识的准确时间已难以考知，但他在结婚前一段时间里就与这两位年轻女士认识并有所交往，则是可以肯定的。其中尤其让沈从文心旌摇动的是高青子。如上所述，《水云》的回忆显示，沈从文正是在与张兆和订婚后、结婚前的那段日子里，却和高青子有了非同一般的交往，二人既欣然“有会于心”，又因“一个人刚好订婚”的“不凑巧”而相见恨晚。沈从文就是带着这种遗憾结了婚并在新婚期间写作了《边城》，他希望用婚姻抵挡“偶然”的引诱、用写作抒发“不凑巧”的憾恨。就此而言，刘洪涛所谓“《边城》是沈从文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又逃避的结果”的判断是大体不错的，只是对《边城》意蕴的分析还不够准确。

诚然，《边城》的写作行为确是沈从文对婚外情诱惑的缓释和逃避，但文本的叙事却无关于婚外情，而着重表现一种近乎无事的悲剧——人在婚恋上的“不凑巧”之错失以及因此而生的憾恨与希望并存的复杂情感。这“不凑巧”在文本和潜文本中是表里同构的：显现在表层的自然是翠翠与天保、傩送三个乡村儿女恋情的“不凑巧”之错失，翠翠的外形和性格并且有“新妇”张兆和的影子，而掩藏在这个田园故事背后的，则是作为丈夫的沈从文自己在婚恋上的“不凑巧”之憾恨。这一表一里的两个“不凑巧”，正是所谓“诗与真”的关系：读者一望而知的是那个显然充满诗意抒情的乡村儿女恋爱的

①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110—111页。

② 刘洪涛：《沈从文小说中的几个人物原型考证》，《沈从文小说新论》第234—23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③ 金介甫：《沈从文传》（符家钦译）第270页注75，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

“不凑巧”故事，而对作者掩藏其后的个人婚恋之“不凑巧”的本事，则往往难知其详，甚至根本没有察觉。但这并不影响读者欣赏这篇小说，因为那个充满诗意抒情的乡村儿女婚恋故事，已成了作者个人爱欲隐衷的一种抒情性寄托，读者即使完全不知其“本事”的存在，也无碍于他们领会作者所倾心营造的情境和意境：“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现在我们明白了这情境和意境源于现代文人沈从文切身的生命体验和爱欲苦闷，却不必就此去否认《边城》故事的田园牧歌表征。自然，也无须再那么夸大乡土、都市等元素在沈从文作品中的文化对抗意义，其实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过是沈从文借以表达其独特的生命体验——尤其是爱欲苦闷——的修辞手段或者说艺术风景。就此而言，评论界和学术界长久以来关于《边城》以至沈从文整个乡土叙事的真与不真之争，就不免刻舟求剑、徒费口舌了。既然《边城》中的翠翠和二老“不凑巧”的乡土爱情传奇故事，乃是沈从文自身“不凑巧”的婚恋体验和爱欲苦闷的寄托性载体，则乡土风俗人事作为作者寄托怀抱的艺术风景、取便表达的修辞策略，也就无所谓真与不真了，何必拘泥较真呢。当然，沈从文由此创造出的一系列乡村儿女形象，自有其独立的艺术生命，并且我也完全相信李健吾所谓“作者爱他《边城》里的人物”的判断是无可置疑的，但我想也不妨指出事情的另一方面：尽管沈从文创造了翠翠、萧萧、三三等美丽善良的乡村少女形象，但进城后的文艺青年沈从文其实也难免“见异思迁”，他真正心爱的恐怕并非翠翠、萧萧和三三那样的乡村少女，而是女学生张兆和、女职员高青子、高校校花俞珊等现代的都市知识女性。自然了，这后一类女性同时也就成了沈从文的烦恼之所在。

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问世以来，爱欲的哀乐抑扬及其变形的释放，就成了被解密的人性隐秘，不久也成了文学所竭力揭示的人性奥秘。而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弗洛伊德学说以及吸收了弗洛伊德学说的文艺学——即所谓“苦闷的象征”的文艺观，在中国新文坛上也流行不衰。沈从文显然是受了这一思潮的不小影响，因而近取诸身，致力于在文艺创作中表达他对人性的这一奥秘的体验。对此，沈从文

是坦然承认的。^① 他的美国研究者金介甫也曾“指出了《边城》小说中有弗洛伊德象征派的影响”，并说“沈在1980年6月27日和我的谈话中，承认了这一点”。^② 现在看来，这种影响的来源也并不限于弗洛伊德，还包括另一位性心理学家葛理斯，而他们的综合影响不仅促使30年代的沈从文形成了一种用乡土的或古典的传奇故事寄托其爱欲隐衷的艺术表现方式，而且还深刻地作用于他的行为方式——当沈从文宣称“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方得到了完全排泄与弥补”时，《边城》的写作其实就成了他自觉地缓释和调适自己受压抑的爱欲的一种行为方式，而惟其“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由来已久，则《边城》就不可能是沈从文“排泄与弥补”其受压抑的爱欲的开始之作，并且即使在“排泄与弥补”了过去的爱欲积郁之后，也还会有新的爱欲冲动和新的压抑之产生，所以《边城》也不大可能是沈从文“排泄与弥补”其爱欲苦闷的终结之作。

也因此，欲明事情之究竟，还得从头说起；而欲知后事如何，还需下文分解。

从“爱欲的压抑”到“情绪的体操”： 沈从文的爱欲观与文学观之回溯

的确，对沈从文来说，“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也即爱欲的压抑，真可谓由来久矣，而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又委实过久地被人忽视了。

① 沈从文曾以相当熟络的口吻说到“苦闷的象征”。如自叙传小说《焕乎先生》一开篇就写小说家焕乎先生的创作生活：“一些散乱无章的稿纸，或者稿纸上除了三两行字以外又画得有一只极可哭的牛，与一个人头一类，得不拘一个人有在这样情形下摄一个影，这便是可以名之为忧郁的创造了。若是画一幅画，画由他自己指定，则这个画将成为一幅苦闷象征的名作；他是苦恼着。”按，此篇原名《新梦》，连载于1928年5月1日—5日的《晨报副刊》上，后改名《焕乎先生》，收入小说集《好管闲事的人》，新月书店，1928年7月出版。这两个版本均作“极可哭的牛”，窃疑应作“极可笑的牛”，或因“笑”、“哭”手形相近而误排。

② 金介甫：《沈从文传》（符家钦译）第235页注78。